

02

河	西	女	史
資	料	選	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河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區委员会
文史資料委员会編

主 编：万树明
副 主 编：李茂森 梁孟儒
责任编辑：冯人文
执行编辑：步丰基 周慰曾
 魏锡林 张光宇

《河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准印号：津新出图字（96）第 0066828 号

内部发行

序

万树明

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河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本区各级领导关心支持下，和读者见面了。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河西区文史资料出版工作的空白，这对于为当前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提供借鉴，为修史编志和学术研究提供佐证，对教育当代，惠及子孙，无疑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位于天津市市区东南隅、海河西部的河西区，解放前是一个工、农、商并存的地区，早在1895年，河西区的一片土地曾沦为德国租界地，洋房别墅与土屋棚铺形成鲜明的对比。河西区在解放前可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复杂的历史渊源，使河西区的工商业兴衰和民族资本产生、发展的艰辛过程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都有其独特之处。

避免历史陈迹的湮没，把有价值的史料留给后人，这是河西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始终如一的遵循和心愿。为此，他们付出了大量的艰辛，一大批耄耋之人壮心不已，为抢救史料奔走联系，考证求源，伏案疾书，从而使《河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的编辑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书刊载的三十四篇文章，作为第一辑，共计十二万余字，从工商史话、教育溯源、租界小史、人物、宗教、文化等不同侧面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河西区的过去。在篇幅内容上不求一律，在文章结构上不拘一格，大部分文章是当事人的亲闻、亲见和亲身经历，具有翔实、准确的资料借鉴和参考作用，读必有所获。这些都可算作是本书的明显特点。

限于编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目录

序	万树明 (1)
---------	-----------

工商史话

回顾大成五十年	吴景贤 (1)
河西饮食业的变迁	张乃武 (13)
鸿起顺饭馆六十年	魏锡林 (22)
范贵林和桂发祥麻花	刘建章 (30)
津门第一居——玉川居	刘建章 (33)
“起士林”的沿革	曾克鑫 (36)
盛行于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水铺	刘建章 步丰基 (39)
窝头大王	刘建章 (43)
天津大力制铁厂的创建与转轨	张骏发 (44)
裕中——七星——感光	
——天津摄影工业创建始末	李文琪 (50)
北洋纱厂补遗	周慰曾 (56)
创建马场汽车修理厂	梁孟儒 (62)

教育溯源

新华中学的沿革	王福重 (66)
兴学的沃土	
——从博文书院到海河中学	张绍祖 (76)

忆在志达就读的日子里	于之洋 (83)
津沽大学渊源	周慰曾 (87)
从“市师”到“师专”	张绍祖 (89)

津门第一庙

挂甲寺庆音法鼓銮驾老会	周骥良 (99)
津门第一庙——挂甲寺	王翁如 (102)
挂甲寺的创建年代及其兴衰史	孙殿元 (104)

河西春秋

天津德租界小史	杨大辛 (108)
马场道史话	周良 (113)
北京影院今昔杂谈	董嘉田 崔英 曾克鑫 (115)
山东会馆的始末	
——同乡会——山东公学——山东医院	步丰基 (122)
德国球房的演变	周慰曾 (135)
漫谈当年天津德租界	魏锡林 (137)
回忆德美医院	李步峰 (143)
美国营盘梗概	王有才 米秀洋 (153)
谦德庄耆旧话未来	魏锡林 整理 (156)
人民公园今昔	崔良承 (163)
天津市河西区清真寺的由来	张凤奎 (166)

人物述林

陈祖瀛的一生	步丰基 (169)
范家恩与淮扬大酒楼	刘建章 史秀玲 (176)
记新安电机厂创办人孙鼎	周慰曾 (180)

回顾大成五十年

吴景贤

天津大成五金厂的前身是天津大成贸易行,该行是在四十年代驰名全国的香港大成行总行设在天津的一个分支机构。追溯原始,有必要简述一下原始的大成行的创建与发展。

(一)大成行的创建

大成行的主要创始人陈祖沛是广东新会县人,幼年家庭生活困难,14岁失学,只身到香港找他大哥陈祖潘谋生。他被介绍到山东帮开设的“南北行”店里当学徒,由于他聪慧好学,又肯吃苦耐劳,满师后由跑街、采购而逐步擢升为经纪人的助手。陈祖沛在商海中逐渐成熟之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凭他的经营才华,逐渐升迁,成为一家商行的代理人。但他不甘久居篱下,1938年,22岁的陈祖沛毅然辞去香港的工作,回到广州。他约集了几位好友,如周广、周流(沅鏊)、董江、潘应驹等人共同集资3000毫洋(当时折合港币1650元),接兑了广州一家歇业的“光成行”的铺底,改名为“大成行”。这就是“大成”二字的来源。

陈祖沛自任经理,主要经营南北土产杂货、粮、油、糖等批发交易。当时正值广州沦陷,许多大商行老板逃到香港。但

他们在广州外轮货仓存有许多杂货粮食，无法脱手。陈祖沛靠他的信誉，把这些生意揽到手，由大成行经手销售归款。大成行一炮打响，同业为之侧目。

我从1939年底参加大成行工作，经历了大成行逐步扩展和兴旺，亲身经历了大成行的风风雨雨，以及由商转工，成立大成五金厂的经过。多年的往事记述下来，或许能对研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有些参考价值，误漏之处，请识者指正。

(二)大成行的发展

当年广州大成行从小宗批发生意做起，代客买卖，逐步扩大，由粮、油、糖到经营各种杂货，由各地土产品而扩大到药材、五金，由零担托运到长期包船贩运。它所经营的品种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挑选热门货，都是当时国内最紧缺与最急需的物资，如五金、轮胎、纸张、油脂、自行车、卡车、摩托车、个别中西药材等等。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挑选利较大的生意去做，必要时就集中货金与人力专搞一项可观的生意。

大成行在陈祖沛的锐意经营下，迅速发展，各地驻庄陆续升级成立分行，以扩大经营。1942年成立上海分行，派我前去开拓市场。大成行曾集中资金由广东新会运到上海100万把葵扇，抓住缺货季节，大量抛售，获利甚丰。全行资产当时猛增到港币30万元。

1943年陈祖沛派回瑞圃到天津第一次设点，在交通货栈搭庄，发现天津是大有作为之处。另派黄家驊任经理，在河东民族路30号购房，扩大经营。翌年，天津驻庄升格为分行。1945年春，陈祖沛通过来自天津的信息，了解到由于战争，南北交通中断，华北地区土特产品大量积压。他分析世界战争形势，预见到抗战将要结束，于是他毅然决定把各地分行资金调到天津，购进大

量土特产和中药材，集中储存以备出口，这在当时却是惊人之举。不久，日本战败投降。大成行的土特产、药材随着津港复航的首班货轮运往香港，拔了头筹，获利三倍，使大成行的资金由原来的30万港元猛增至80万港元。陈祖沛因此成为香港商界名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大成行抓住抗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加强香港分行的阵容，请黄葆林任经理，开展与国内贸易往来；二是向内地开拓业务，设立分行，1946年建立汉口分行，由周流负责，1947年派我去长沙任分行经理，附带经营碾米厂，派简家珍在重庆建立分行，经营面粉、麻、桐油、肉松及榨油厂等业务。1948年，大成行鉴于国内战争情况，乃将总公司由广州移往香港，资金集中使用，但陈祖沛仍往来于各分行之间，巡回指挥业务，是年又北上青岛，派陈子葵任青岛分行经理，意在与解放区开展土产经营业务，主要经营食油、花生、枣、烟叶、芝麻等。青岛行成立虽晚，但后来居上，在1949年战火当中也设法作了不少业务，如在青岛售于英商西甘梅斯公司花生仁7000吨，散装花生油3000吨。因质量上乘，安排装船迅速稳妥，获得外商信任。

（三）大成行职工的爱国行动

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打响之初，天津大商户轻信国民党宣传，心怀恐惧，纷纷南逃，资金外调，南方各大公司驻津人员也纷纷撤离，这时大成行却反而由香港向天津增派人员，率先开展南北贸易。陈祖沛的爱国进步决策和全行职工们的爱国行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由来已久。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陈祖沛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思慕突然来到他家和他接触。刘思慕有意识地向陈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而陈本来就有正义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有所厌恶，

通过刘思慕进一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加深了爱国主义思想。当时刘思慕公开身份是香港《华商报》的总编，实际上刘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奉命在香港工作的。这一点陈当然是不知道的。在刘思慕的引介下，陈结识了香港工商界上层进步人士黄长水、陈君冷、邓文钊等人。陈祖沛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几年来他对进步事业给予多次经济支援，累计达10多万港元。

1947年初，中共驻港工商统战工作负责人许涤新、饶彰风等倡议在香港进步工商人士中成立了“华侨工商俱乐部”。由黄长水任会长。俱乐部在香港政府注册，以合法地位团结教育华侨和港澳工商人士，支持人民解放事业。陈祖沛是俱乐部骨干成员之一。1948年，有沈钧儒、黄炎培等一大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陆续来到香港，从事迎接全国解放的活动。民主建国会在华侨工商俱乐部的部分成员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建立了香港民建支部。陈君冷、陈广生、王玉、黄穗、郑可、陈祖沛等都是会员。作为一个有觉悟的爱国商人，大成行的陈祖沛、陈广生和全体职工早就向往着解放，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年底，许涤新同志在工商俱乐部聚餐会上动员大家组织力量通过经济贸易来支援解放区。当时平津地区即将解放，解放区日益扩大，但几年来遭受美蒋封锁，各种战略物资相当匮乏。南北往来航船由于战事关系极少，北方土产特产又运不出去，南北贸易处于停滞状态。陈祖沛考虑，当时香港华商大多数都听信谣言，不敢和共产党做生意。如果大成行能出头包船往北方运货，有了效果，自然会带动一大片，但他也清楚地知道，此行虽然有利可图，但要冒很大风险。何况北上航船要经过台湾海峡，随时可能遇上国民党军舰拦截，一旦被查出是运往解放区的货，必被没收，人员必被扣留，后果可想而知，要冒这样的风险，

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当时大成行总经理陈祖沛才30多岁，他说服在港股东，带头集资，筹措120万元港币作为资金，其中大成行占80%，泉昌、恒达、三光公司共负担20%，组成“新中公司”迅速着手在港采购解放区急需的物资。新中公司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由大成行职工兼任。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电讯传来，香港得知天津大成行安然无恙。陆续传来天津军管会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开展贸易的政策。天津和香港大成行立即活跃起来，电报频频往来，认定目标，坚定信心，觅船北上送货。

经友人介绍，我们租妥3000吨英商船“三民号”，船长豪顿是英国人。三月下旬驶往九龙太古仓库装汽油、柴油。豪顿一见是危险品，即拒绝装载，陈祖沛将早就准备好的“红包”赏给船长和全体船员。果然钱能通神，船长应允装油，并且办了“保险”。随后又在尾仓装上西药、卡车、橡胶和轮船等解放区急需物资。一切就绪，于3月28日黄昏开始这次危险的航程。陈祖沛亲自随船北上。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黄长水、陈君冷、郭宜兴、黄佩球等和大成行在香港全体职员都到码头送行。当时气氛十分严肃，此行成败，大家心中都没有底。

在启航前夕，香港中共地下党委托大成行护送四位著名民主人士同船前往天津转去北平。他们是马思聪、萨空了、欧阳予倩和金仲华，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大会。陈祖沛欣然应允，把四人安置在水手仓内，伪装为大成行随船押运的职员，借用大成行职员的姓名来应付检查人员，而实际上那四名真正的大成行职员却事前藏匿在黑暗的货舱里。等到离港例行检查人员核对完毕，水警轮离开，货轮出港后，那四个真正的职员才回到甲板上来执行职务。一路上这四位民主人士与大家相谈甚欢，大家都渴望见到解放的天津真实情况。特别是欧阳予倩先生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使大家受益匪浅。马思聪与陈祖沛抵足

而眠，畅谈祖国的未来。一个向往民主的音乐家，一个热爱祖国的商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按船长的计划趁夜间闯过台湾海峡，茫茫大海漆黑一片，紧张与神秘的气氛笼罩全船。突然大家担心的事终于来临了，一艘蒋家军舰尾随而来，发出讯号命令停船受检查。船长镇定地下令：一面减速前进，一面用灯语回答询问：“我们是英国船，装一般货物去南韩。”当时往来香港和南韩、日本的外国商船很多，蒋舰照见英国商船旗帜，信以为真，也就没有靠近检查。大成行的这船“危险品”是靠了英国朋友豪顿的机智才得顺利过关。自然，陈祖沛为此又送了红包，并邀请全船人员共干一杯，以示庆贺。

船航行了八天，经过大沽口外长岛，岛上还盘踞着由天津溃退下来的蒋军四万多人，他们自顾不暇，也未出来骚扰。

“三民号”货轮平安到达天津港。天津军管会派代表前来迎接随船来的四位民主人士。货轮在塘沽将汽油、柴油卸完，然后上溯海河，抵天津大连码头，天津大成分行全体职工在码头迎接，互相拥抱，跳跃欢呼，共庆初航成功。

“三民号”在天津停泊数日，回程载往香港的是北方土产，其中有5000包黑枣和生地，还有绿豆和中药材。陈祖沛安排好津行事务，仍随船返港。此次北上送货，获得天津军管会赞许，认为是大成行支援解放区，热爱新中国的实际行动。

“三民号”返港，在《华商报》以显著的版面作了报道，震撼了港澳工商界，纷纷到大成行来问长问短。所运来的华北土产相当畅销。此次首航，新中公司获利虽少，但它的成功却给港澳工商界影响甚大，驱散大家心中疑云，设法和解放区进行贸易的人与日俱增。

应天津外贸部门的要求，新中公司于同年5月下旬，再租用“三民号”，装了一船纸张（钞票纸、道林纸、白报纸），

系供应印制新人民币和报纸所急需。当时新中国即将宣布诞生，此行与其说是经济贸易，不如说是政治任务比较妥切。第二次航行仍由首次五名大成行职员负责押送，由杜志成总管。同船北上的有陈祖沛及其弟陈祖瀛的夫人张稚娴（陈祖瀛已先期在津任大成津行经理），另有股东黄赛贞夫妇、新中公司股东郭宜兴（恒达经理）等亦要到北方开展业务。6月初货装齐，办完手续启航。再次夜闯台湾海峡，又遭到蒋舰尾随盘查。船长用英语（灯光讯号）回答：“英匡船，装一般货，去日本。”而顺利过关，七天后安全到达天津。回程货由天津大成行配装花生油、豆饼、粉丝、黑枣、中药材等，6月中旬启程返港。此次陈祖沛留在天津半年，亲身体会到解放后的天津欣欣向荣，共产党员俭朴、严肃、进步、廉洁、民主的作风，他由衷地敬佩。

两次航贸成功，可以说大成行、新中公司的“两航天津”是带了个好头。新中国成立后，南北通航日渐恢复正常。但大成行以后的多次航运过程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如有一次所装的数百箱马口铁皮在途中被蒋舰检查出来，全部没收了，随行押运人员侥幸无恙。

1950年，陈祖沛随港澳工商界首次回国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过程中得悉内地经济复苏，需要大量钢材，他马上打电报指令香港大成行订购大批钢材，要求迅即设法运回国内。观光团在东北受到朱德同志和陈云同志接见，国家领导人热情介绍了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一再强调欢迎港澳实业家回大陆投资办工业。陈祖沛受到很大鼓舞，认定在新中国经营工商业是大有可为，更增加了使大成行北上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陈祖沛回港后召集全体股东和各分行经理开会，详细介绍了在大陆参观访问的经过和自己的感想与决心，分析了回大陆办企业的优点与大成行今后的前途。说服了大家，通过了将总

行迁往天津，资金调回国内，三年内暂不分红利只发股息的各项决定。当时绝大多数热烈赞同，也有极少数人要求退股抽走资金，但并不影响大局。1951年计算，大成行全部资产，通过各种形式转回国内，共达1700万港元（折合旧人民币630亿元），这个数额是1939年投资时的1万倍。同时，陈祖沛将他在港的私人生活资产包括房产住宅也卖掉，将钱全部转回国内，也携带全家老少回大陆定居办企业。其胞弟陈祖藏早于1948年即调来天津工作。津行初期职员有黄家骥、邓志成、李籍富等人，都是大成的骨干。他们在华安街11号购房做为营业部、仓库和加工点，准备在天津大干一场，津行人员与陈祖沛的目标是一致的。

（四）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的创建与发展

陈祖沛在解放初期通过参观访问和学习，他清楚地意识到五种经济成份以国营为主，国家在各地设了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进出口权牢牢地掌握在国营进出口公司手中。他敏锐地预见到大成行过去的那一套经营方式已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能与国营争利，而工业建设确是新中国的急需，大成行把重点转向工业生产，对国对己都是有利的。1950年，他审时度势，决心在天津建立一座具有先进水平的五金机械厂。这一设想得到政府的赞许与支持，在河西区陈塘庄拨给建厂基地40亩，基建立即上马，由闫元琳负责。同时陈祖沛在香港收购了一家制钉镀锌铁丝厂的全部机械设备，全部拆卸下来，加订了英国镀锌机，添购了拔丝机和一些必要的机床，分别打包装船，并设法冲破封锁秘密运抵天津。事前已聘请到原香港厂的厂长邓鸿仪来天津担任厂长，约请香港合众五金厂厂长陈广生（陈铭振先生的公子，曾留学英国，系机械专家）来担任总工程师。同

时在香港招聘了近百名技术工人，又延聘了几位有经验的机械工程师，如曹廷禧、伍建中、刘义杰、岑绍斌、雷作斌、阮志山等来增加技术力量。这些人都是天津建厂时的骨干，后来他们为大成和其它厂培训了一批出色的技术人才，这说明陈祖沛是有长远眼光的。

政府在各方面开放绿灯，手续简便，基建材料充分供应，大成员工在赤诚爱国心鼓舞下，群策群力，很快在1951年即建成一座当时来说具有先进水平的五金机械厂。主要产品是元钉和镀锌铁丝，附设机械制造部，除总装和维修全厂机器设备外，并可制造所需机器。国家给予免税三年的优惠，更激发了大成员工的干劲。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成五金厂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生产高强度镀锌铁丝，耐锈力极强，用于制造战地电话线，并专门研制生产大批坑道用铁钉，以支援前线。大成全体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竞相捐款，为志愿军购买了苏联制战斗机三架。在国家发行第一批折实公债时，大成行企业带头认购公债15万分（每分折合港币7元，共105万港元），受到政府表扬。

解放初期，大成行总经理陈祖沛通过学习政策，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对建设的优越性，他经常和我们这些大成高层成员交换意见，谈他的感受。大家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兴旺发达，才有前途。早在1950年，他曾通过黄长水向党组织表示希望把大成行转为国营企业。1951年他又通过刘思慕向上海市工商局长许涤新再次提出这一意愿。只因为时过早，当年正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尚未有这方面的政策，地方当局未能接受他的良好意愿。

1952年，天津大成分行经理陈祖瀛被任第六区工商联主委。陈祖沛提出大成行与各厂可实行“私私合并”的尝试。1953年陈祖瀛经工商局批准，将业务不振周转困难的私营杨联

福铁工厂合并进大成五金机械厂。1954年大成副总经理周流把青岛大成榨油厂与一家已停业的油厂合并，扩大生产。上海、广州的大成分行也有此尝试。

（五）公私合营的新气象

1955年，在公私合营高潮还未到来前，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就清产核资，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一伟大壮举的准备工作。随后，各地的大成分行与厂都在所在地实行了公私合营后分别与有关厂合并，大成总行就不存在了。香港的大成行，在陈祖沛的坚决要求下，也并入了驻香港的国营土产进出口公司机构。在建国初期，我国在香港的公私合营企业仅此一家，大成行首开先例。

我在合营前1954年调来天津大成行担任副总经理，不久陈祖沛回广州担任市工商联副主委，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工作很忙。天津大成行由陈祖瀛负责，根据政府的“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来发展，业务蒸蒸日上。当时业务主要是由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品质量又高，镀锌铅丝和元钉行销全国，供不应求。厂机械部试制的化工机械，很受化工部门欢迎，一再催促扩大生产。后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大成厂一分为二。原属重工业局的大成五金机械厂改名为“大成五金厂”划归冶金局领导；将制造机械部分分出（包括原杨联福铁工厂，又并进永和祥机器厂）另成立“化工机械厂”，划归化工局领导，从事制造橡胶机械和锻造机械，后来又根据专业的不同再分为两个厂。原大成厂所培训出来的技术人员都成为各厂的骨干力量。

公私合营时，大成行在全国有八个分行，五个工厂，但正式为私方人员（即资方）只有六人。就天津来说，只有陈祖瀛